

复合文化网络：乡村振兴中主体的内生实践逻辑

——基于云南多民族文化集居区的经验研究

文军 卢素文

贵州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摘要：具有社会文化差距的内外主体之间的互动如何进行，成为我国乡村振兴内生实践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多民族文化集居区的案例分析，借鉴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结合“发展”的内涵建构了集知识、关系和资源要素为一体的复合文化网络框架，以此来解释外部主体顺利进入内部系统的主体实践逻辑。研究发现，搭建实践知识的共同框架，为外部主体进入内部主体的系统提供行动依据；家庭和组织双重关系促进内外主体的联动，赋予内部主体参与发展的能力；情境中调试资源利用规则和营造资源对接的合作网络，提高外部向内部输入资源的效率。然而，内部和外部主体之间的权力差距仍然存在且难以完全消解，双方仍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磨合。

关键词：乡村振兴；内生实践逻辑；复合文化网络；多民族文化集居区；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3)08-0136-09

DOI:10.13713/j.cnki.cssci.2023.08.013

作者简介：文军，贵州大学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研究人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城乡关系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理论；；卢素文，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社区建设研究、妇女问题。；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机制研究(22&ZD18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不确定性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及其体系建构(22ASH002)”；云南大学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重大项目“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云南)”(CRSS)；

一、问题的提出：内外主体的互动关系

自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后，国家连续六年都以不同形式强调了内生动力的重要性。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上又再次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1]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指向乡村内部的激励政策和措施，是为了让农民在农业发展、乡土文化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发展内生的能力。乡村和农民的内生动力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乡村发展系统中出现了内部与外部力量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内外部主体之间的文化差异给乡村振兴的内生实践带来了多重性后果。这就给我们思考乡村的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留下了充分的讨论空间。

按照发展主体的内外之别，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外生发展、内生发展和新内生发展模式三种。^[1]但内外主体力量之间的差异，使得依靠外部力量还是内部力量来促进发展的问題仍尚未完全清晰。^[2]因为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发展模式，本质上都是同一个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切入点。于是，Ray 根据超越内生—外生的混合模型提出了“新内生发展模式”，将乡村发展视为“来自上层、中层与地方层面在各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3]从理论来看，新内生发展模式处理了内外主体之间的理论连接源于何处、通向何方。它要求内外主体的结合和动态互动，调和彼此之间发展力量的张力，融合了外生和内生模式的积极方面。从实践来看，它将自上而下的外部发展规划与自下而上的内部参与网络之间的纵向关系，以及本地与相邻地区之间的横向关系结合起来。^[4]新内生发展模式描述的是一种扎根于本土社区同时面向外部的发展方式，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内生实践过程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但是新内生发展模式没有明确指出内外主体在现实情境中的资源互动、能力建设应该如何结合。以至于有研究指出：“新内生发展模式可能只是一种新形式的“外生”，是逃避“城市”生活方式的方法，对内部主体的意义并不大。”^[5]

其实，发展是一种整体性的概念，既与外部力量带动的地方经济、政治变化有关，也与社区的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农村发展的重要资产，不仅能把农村、农民与更加广泛的国家、市场的发展框架联系起来，还能向农村社区内部转化，并用于促进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网络。^[6]新内生发展模式中外主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在这种差距尤为明显的多民族文化集居区，主体如何推动地区发展从而进行乡村内生实践，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如果只是照搬新内生发展模式中结合内外主体资源的方式，在文化差异无法消弭的状况下，内外发展系统之间的鸿沟似乎很难跨越。显然，这一模式的应用情境需要结合我国乡村发展的现实情境重新加以思考。据此，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外生主体力量如何融入乡村的内部主体的系统并实现二者的联合发展，最终共同作用于乡村振兴的目标？

为了回答内外主体在具有差异性的文化中如何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实践，笔者及团队在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寻甸县)和红河县这两个民族文化集居区开展了经验调查。²寻甸县境内居住的回、苗、彝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23.88%。红河县境内居住的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94%。寻甸县和红河县既是多民族文化集居区，也是乡村振兴内生实践中内外主体良性互动的典型代表。近年来，两县在不同程度上承接了来自上海市政府、高校、公司、社会组织等的资源。比如，作为对口帮扶单位之一的华东师范大学三年来先后向寻甸县捐赠帮扶资金 660 万元，帮助寻甸县销售农副产品 1000 余万元。该校成立的“新内生发展项目组”还先后培育志愿服务队、舞蹈队、合唱队、养殖合作社等农民组织；撬动异地的公司、基金会等投入累积超 30 万元。同时，上海市长宁区政府与红河县开展沪滇产业协作项目，开发了生态梯田鸭养殖基地、成立了棕榈树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产业集中式扶贫，起到了助农增富的作用。然而，乡村振兴的内生实践并非简单的资源输入，而需要在文化的磨合中不断调适。

笔者及团队希望通过对寻甸县和红河县经验案例的分析，揭示具有文化差异的内外主体的互动关系如何进行。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内外主体怎么跨越自身所处系统的界限，并顺利进入对方的系统，最终共同作用于乡村发展的全过程。这回应了在乡村振兴的内生实践过程中，如何调和内外主体的文化差异以促进发展进程这一本源性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理论，用以解释国家权力扩张如何造成乡村社会变革的问题。他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乡村精英，都不得不在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寻求正当性和合法性，从而获得当地的控制权。^{3[7]}这一结论对于传统时期关于乡村控制的论述中有较强的解释力，也同样能够对应乡村如今的发展现状。虽然乡村振兴推动的是乡土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部变革，但它们仍然需要以本土的文化网络及其关系结构作为行动框架，并在主体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的交织中得以持续。正如有研究指出：乡村文化网络中的亲属关系，不同主体之间的庇护关系、社会身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观念心态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外部资本扶助乡村发展效果。^[8]乡村振兴实践中的主体实践逻辑，正是外部主体适应内部主体所处文化网络的表现。

具体而言，一是把“权力的文化网络”与“发展”的内涵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二者都强调内外主体在文化网络中的关系

互动。“权力的文化网络”强调国家作为外部主体时如何控制乡村的内部主体。“发展”强调外部主体进行的乡村内生实践过程，可以看作携带资源的公司、高校、社会组织等进入少数民族文化集居区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并逐步在当地文化网络中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权力。二是即使在文化、资源等方面处于强势地位的外部主体，也不得不在处理内外主体的文化差异后再进行实践。比如，即使有当地政府的诚信背书，外部主体也需要在部分精英的帮助下获得农民的信任，否则农民很容易消极抵抗甚至直接抗拒。

不过，主体的实践逻辑与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并不完全适配。“权力的文化网络”聚焦于优势主体如何让劣势主体服从自己的意志，关注的是权力层面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乡村振兴的常规模式，是具有优势地位的外部主体让处于弱势地位内部主体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配合(服从)”。内外主体的实践逻辑需要基于但又超越单一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解释框架。无论是在目标还是实现过程方面，乡村内生实践都与发展紧密相连且同出一辙。因此，我们可以从“发展”视角改造这一框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曾提出：把“发展”与知识形式和权力技术相结合，细化“发展”为三个维度：“描述发展的知识形式(forms of knowledge)；控制发展实践的权力体系；由发展话语所创造出来的主体性形式”。^[9]受此启发，笔者把“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与乡村“发展”的内涵和现实情况相结合，提出“复合文化网络”这一新的分析框架来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复合文化网络”是指在乡土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网络中，内外发展主体秉承着相同或相近的知识理念，从而顺利地实现资源的控制和利用。在乡村内生实践的过程中，内外主体遵循的是由知识、关系与资源三要素复合而成的文化网络(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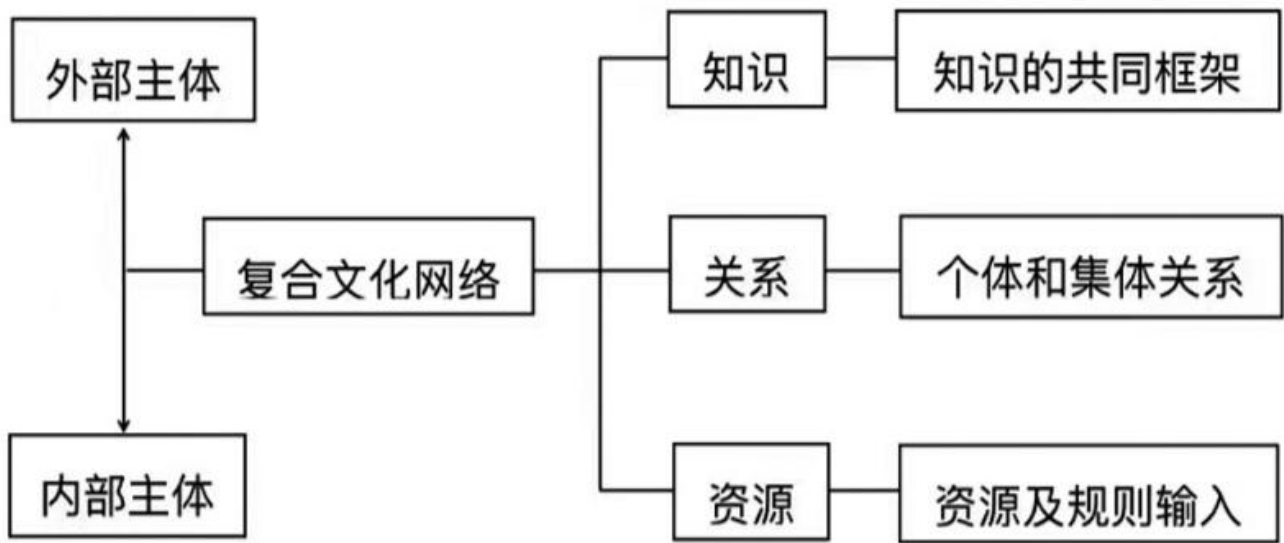


图1 复合文化网络的分析框架

所谓“知识”，是指内外主体搭建实践知识的共同框架。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一个“知识社会”，社会发展越发受到“知识”的驱动，^[10]知识要素要求内外主体实现城乡发展知识的融合与共通，利用专业知识带动乡村发展。多民族文化集居区的知识与外部主体携带的发展知识之间相差较大，需要由内外主体共同生产出适合的知识。所谓“关系”，是指外部主体经由关系这一途径为内部主体提供发展的行动框架，进而提高内部主体的参与能力。发展意味着我们将采取一种以过程为中心(process centered)、注重多方参与的关系策略。^[11]在家庭和组织“关系”赋能下，农民联结起来，共同为多民族文化集居区的发展做出贡献。所谓“资源”，是指外部主体在合适的情境中向内部输入资源。发展是内外主体在乡村文化网络中控制、利用资源的过程。多民族集居区意味着：外部主体输入资源的情境中包含着多种文化附带的输入规则。外部主体需要根据具体情境营造资源对接的合适空间。

三、主体内生实践中复合文化网络的形成

前述分析指出，乡村振兴中的内生发展实践是内外主体在知识、关系与资源的复合文化网络中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综合结果，具体形成过程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搭建实践知识的共同框架

内部和外部“知识”之间的差别较大。因为内部“知识”是乡土社会自然演变和农民基于经验所形成，很少受到外部的影响。不过，内外部“知识”之间的界限仍有一定的突破口，可以通过主体的互动建立起共同的框架。

1. 基层党组织引领外部知识的转换。

外部“知识”进入内部主体的系统时，如果能够经由乡村关键人物的认可和转化，则可以规避常识性错误和降低运用成本。部分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中的引领者，能够担任传递和转换“知识”中介的角色。

一是外部主体保障基层党组织在使用、控制与生产“知识”上的主导作用。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人员不太了解外部“知识”，也不擅长处理“知识”差异带来的冲突。在党组织的带领下，虽然寻甸县泽铁村成立了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但能够正常运转的合作社并不多。究其根源，这些组织只是模仿了其他地区成功组织的形式，而没有结合村庄的资源加以改造，因此无法掌握运营规律。据此，新内生发展项目组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向驻村党员干部了解当地发展的现状及困难，在管理制度、工作经验上对他们进行培训。项目组还协助党组织制定村级党群活动规约和民主议事公约，建立村级民主治理制度。党组织基于本村的民族文化特色和资源优势，筛选出一批适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大力扶持，有效解决了合作社运营的难题。党组织经过外部主体的制度和能力建设后，了解到内外“知识”的区别，识别外部“知识”在本社区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由此，党组织才能更好地为指导农村社区的资源利用、制度建设、技术创新，帮助农民寻找到适合本土发展价值观的道路。

二是外部主体通过基层党组织增加内外的“知识”联系。无论是在寻甸县还是红河县，都有相当一部分的村庄没能配备公共议事空间。村庄的大小事情基本靠村干部向农民传递。虽然这种形式满足了农民了解国家法规、政策等的需求，但很难满足他们对于种植或养殖技术，或是医疗、教育知识等的新需求。新内生发展项目组联合寻甸县泽铁村的党组织，一同改造了本村的党群活动室、民主议事室、乡村图书室等硬件设施，为党员和农民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议事空间。项目组还支持党组织建立公共交流的规则，培养了农民自主解决问题、友好交流技能的规则意识。农民在公共议事空间中互相分享信息，再由各小组组长反映给党组织，最后由党组织链接资源来满足农民的需求。例如，泽铁村获捐的卫生健康医疗设施和儿童图书绘本就是通过这一形式实现的。农民在党组织召开的集体会议上提出想要学习医疗知识，再由党组织反馈给项目组。项目组便联系了上海市某医院的知名专家，通过视频会议为他们开设医疗科普讲座。党组织作为传递内外知识的“中间人”，利用内外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连接内外“知识”，推动农民形成适合本村庄发展的认知与行为模式。

2. 农民生产本土知识的认同。

“知识”的生产具有反身性。主体能否发挥“知识”在内生实践中的效果，最终取决于内部主体承接外部“知识”的能力。这需要农民主动参与“知识”生产和反思过程。

一是外部主体培育内部主体表达“知识”优势的能力。一方面，内部“知识”通常都是内部主体基于已有“知识”的无意识共享，不具备统一性或公开性的表达方式。如果不是长期扎根于当地，外部主体很难完全领悟内部“知识”的潜在意涵。另一方面，发展通常被看作是由专家系统理性决策和管理。发展的机制是专家系统通过一整套的技术、策略和实践完成专业知识的传递。^[8]在外部“知识”的强力冲击下，内部主体并不看重内部“知识”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对它与外部界限的认知也比较

模糊。这就导致外部主体持有的发展价值观和想要达到的发展状态并不一定契合内部主体的发展需求。由于多民族聚居区语言、文字等的多样性，农民关于发展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很难完全达成一致，外部主体也无法了解他们真实的发展需求。新内生发展项目组发挥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身份优势，带领寻甸县泽铁村农民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社区资源地图”“未来社区畅想”等工作坊进行头脑风暴和开展焦点小组讨论，鼓励农民讨论本村庄经济生活、文娱活动等公共议题。经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培训后，农民形成了关于村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等相似性看法。可见，内部主体了解“知识”的差别后，可以形成对“知识”的一致性认知，塑造出致力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积极形象，从而获得来自外部主体更多的支持。内部主体有能力反思外部知识，辨别外部信息甚至是威胁，能够减轻外部主体的过度干预给乡村发展带来的压力。

二是外部主体引导内部主体更新“知识”并付诸行动。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内部主体很难意识到自身“知识”中不符合村庄发展的部分。知识改进和应用方面的行动力也相对较弱。要想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付诸行动，需要外部主体解构和重构内部“知识”，并以适合内部主体能力的方式进行引导。新内生发展项目组在寻甸县泽铁村举办了一次摄影大赛，意图通过影像发声法(photovoice)⁴获悉农民对本村的看法。项目组让农民拍摄乡村环境、乡民教育和乡风文明建设的景象，并向人们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农民用照片记录了本村的民族特色、自然美景的优点，也在其中无声地表达出公共卫生、弱势群体照料的需求。通过影像发声的方式，农民发现村里的很多问题都能自己解决。比如，公共卫生状况比较糟糕，可以由村长或村支书组织每家每户轮流打扫；行动力差的老人做家务有困难，也可以让有爱心的村民提供帮助。可见，外部主体以内部主体适合的方式，引导其意识到自身在社区发展方面“知识”匮乏的状态。这对于接收和驾驭“知识”困难的农民来说，有能力发出声音和付诸行动。更重要的是，农民都是自发、自主地提出问题和解决办法。这说明，即使是诸如农民之类的非专家群体，也可以在外部主体作用下成为“知识”的参与者，有机会成为发展战略的“专家”。内部主体认识到“知识”的作用并主动提供改进的途径和方法，很容易将“知识”转化为发展的引擎。

(二) 双重关系赋能实践主体的参与

“关系”是乡土社会中人们的基本交往模式，对应了“差序格局”中的亲疏远近程度。关系可以为外部主体的社会和人力资本进入内部主体系统提供渠道。针对内部主体出现的关系疏离、个体参与能力薄弱的问题，以“关系”的方式赋能，可以作为建立和保障内部主体发展能力的核心。^[12]

1. 以家庭为基础的关系联动。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提到：“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从家庭关系出发，以伦理组织社会”。^[13]家庭是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底层逻辑，^[14]既能够连接私领域的个体交往，又能通过公领域的社会关系延伸到乡村发展层面。

一是外部主体通过家庭增强内部主体的“关系”联结。相对于个体与个体的私人关系，以家庭为单位建立的集体交往关系更便于内部主体共享团结、合作等价值观念。这让内部主体认识到参与发展的主体和受益者都是他们自己。即使在多种文化并存的多民族文化聚居区，家庭文化也是共通的。在家庭日益个体化的趋势下，农民以家庭为基础的行动逻辑依然没有改变。农民还是优先考虑家庭的关系和发展，采取扩大家庭成员利益的行动策略。新内生发展项目组了解到寻甸县泽铁村的农民都很注重个体家庭，但家庭之间的关系往来却在不断减少。于是，项目组召开了一次集体会议，让大家思考如何通过家庭增加联系。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农民决定开展制作和悬挂家风家训木牌的活动。他们先收集每家每户关于家庭的看法，一同筛选出了数十个不同内容的木牌标语，比如“有德才有福，有爱才有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勤劳为本，节俭家荣”等。这些木牌由项目组负责制作，连同农民代表、村干部等一块入户挂牌。悬挂在家门口的家风家训木牌，既表达了祝福，又增加了家庭之间的共同话题，增加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情感认同。这说明，内部主体在家庭“关系”的联结下，可以形成致力于集体发展的身份，增强归属感和价值感。他们也愿意为村庄这个“大家庭”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是外部主体推动家庭伦理成为协调内部秩序的主要依据。家庭伦理不仅是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原则与规范，还是整个

社会规范形成的基础。它内涵于村规民约、协商民主等制度逻辑，也体现在其与道德伦理相联系的行为规范中。鉴于乡土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农村社区的内部秩序很难完全通过正式的制度加以规范，需要借助非正式的伦理力量进行调整。由家庭伦理发展出的原则作为协调村庄秩序的依据，能让内部主体更容易接受并调整自身行为。新内生发展项目组了解到寻甸县泽铁村普遍存在婚丧嫁娶过于铺张浪费的陋习(比如婚宴一般要持续8天时间)。农民需要在婚丧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直接降低了他们参与本村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于是，项目组通过入户调研，了解到该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普遍认为婚丧嫁娶是千百年来民族特色习俗的传承，也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不应该受到政府或项目组的干预。对此，项目组与县民政局及泽铁村所在街道的工作人员一起，并通过与大量村民深入细致地沟通协商，最后达成了既能简化婚丧流程又能保留民族文化特色的婚丧新仪式公约(比如婚宴由原来的8天改为2天时间)。同时，项目组与政府公开表彰率先进行婚丧移风易俗的家庭，让农民意识到这也是一件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随后，项目组以民主协商的形式，继续拓展和深化农民对各类公共事务民主协商内容和治理流程的认识，成功带领泽铁村村民更新了村规民约，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家庭伦理所塑造的良好的村庄秩序，能够激发内部主体参与发展的动力，切实提高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2. 参与互动式的组织化行动。

外部主体赋能个体参与的方法，并不足以调动内部主体直接参与决策、民主运作过程的自主性。^[15]内部主体通过互动式的组织化行动，增加其与外部主体的互动，并以集体的力量培育自身深度参与社区的能力。

一是组织化行动促使内部主体建立统一的群体身份。不同于传统社会时期的农民，如今流动社会中个体农民的显著特点在于利益和行动的分散性。他们很难培养出共同利益和集体参与村庄发展的能力。在新内生发展项目组支持下，寻甸县泽铁村的农民成立了一支志愿服务队，并提供了照顾村内的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等服务。项目组还以表彰优秀志愿者、服务积分兑换礼品的形式让积极参与的农民获得奖励。此外，项目组也帮助农民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并定期向他们开展组织运营技术和新型种植技术培训。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这些组织即使没有项目组的参与也能够自主运转并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组织的带头人和主要参与者们，几乎都成为了村庄的积极分子。可见，通过组织化行动，内部主体确定了共同参与发展的身份，达成利益的一致性，进而提高他们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和效率。内部主体还借助组织这一形式创造新的社会资本，用以支持村庄的发展。

二是组织化行动满足内部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外部主体在发展进程中的强势地位，往往意味着对内部主体从发展方式到生活方式的控制。组织化行动给予内部主体采取独特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以此破除外部强势力量的限制。在组织化行动的助力下，内部主体可以共同应对村庄中既有的权力结构、文化习俗等的挑战。集体力量帮助他们摆脱既有权力关系结构中的从属地位，持续改善其在发展中的处境。比如，考虑到农村妇女具备的潜能和力量，新内生发展项目组帮助她们成立了舞蹈队和合唱队，为本村及附近村的集体活动无偿提供演出。这些妇女原本都只是在家务农和带孩子，几乎不参与公共事务。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村庄，她们几乎都没有话语权。但舞蹈队和合唱队让她们得到了关注，还能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增强自身在家庭和村庄中的地位。她们得以重新从“优势”“能力”角度来认识自身价值。组织化行动把弱势的内部主体聚集在一起，培养了他们参与发展的进取心和更强的发展力量。内部主体拥有发展能力后，可以了解和制定发展的方向，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和释放发展的力量。这实现了从外生动力到内生动力的转换，从根本上协调发展动力。

(三) 情境中营造实践资源的对接空间

村庄的发展在于内部主体把外部主体的“资源”转换为发展的能量。既有的发展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在外部向内部输入“资源”的过程中出现的。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结构化理论中提到：结构是转换的规则和资源，资源影响规则的测试和确认，规则左右着资源的使用。^[16]考虑到资源所处的文化情境，可知内外“资源”的整合不仅是资源的输入，也是内部主体在资源网络中表达需求和规则调适。外部主体要想给予内部主体控制资源和设计自身发展轨迹的能力，需要考虑“资源”的利用规则和所嵌入的网络。

1. 调适资源利用规则的情境。

外部主体向内部主体输入“资源”时，越来越注重在当地的情境中输入和应用规则。如果没有一个能调适资源规则利用的缓冲地带，外部资源便会直接冲击内部主体的系统并破坏既有平衡。调适“资源”利用规则的情境，在于外部主体通过网络调适利用规则。

一是外部主体建立其与内部主体的信任关系后再输入“资源”。由于文化的固有差异，外部主体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内部主体的信任，也就难以发现内部主体真正的资源需求。寻甸县泽铁村的农民一开始都不愿意参与新内生发展项目组举办的活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活动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于是，项目组决定先建立起双方的信任关系，摸清农民的需求后再帮扶。项目组在实地走访中发现，当地的农民普遍苦于孩子们没有优质的教育条件。于是，项目组便联系上海市的一家公司捐赠了上百本儿童教育类图书，还动员大学生志愿者去当地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经由此事，农民看到了项目组的能力和帮扶意愿，也就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项目组获得农民的依赖和信任后，很快了解到农民的需求，在后续的资源输入中进行的比较顺畅。这说明，外部主体需要先建立其与内部主体的信任关系，再向他们输入“资源”，从而节约输入的成本和精力。然而，在“资源”相关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可能会因内部主体相异的利益立场而出现向信息错乱或扭曲的现象。例如，项目组就曾因为舞蹈队和村长之间的个人矛盾，而误以为舞蹈队已经不再组织活动。在项目组经过多方求证后，才了解到双方的实际情况并努力化解矛盾。可见，外部主体在建立其与内部主体的信任关系时，并不能仅仅依靠村长、支书等正式权威，还需要与村庄的积极分子、长者等非正式权威建立联系。这能够扩大外部主体信息来源的渠道，减少了“资源”对接环节中的信息损耗。

二是外部主体根据内部主体所处的文化情境，及时调适“资源”利用规则。文化情境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在于外部主体如何对待内部主体的文化习俗、社会惯习、社区情理等地方性文化。从实践经验来看，外部主体要想改变不合适的利用情境，主要通过打破内部主体固有的惯习，选择适合他们日常生活、行为逻辑和应用能力的“资源”输入方式。比如，结合红河县甲寅镇的地理位置和竹编手工技艺的人才优势，上海市相关部门投资了130万元支援该镇的竹编工艺建设项目。该项目在当地建了一个展销中心，方便外来游客的参观和购买；还培养了不少工艺传承的接班人。竹编产品远销省内外乃至东南亚，一度成为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这说明，外部“资源”的输入不应该是外部主体向内部主体的资金、人才的跨地区简单调配，而是在于“资源”规则的认知和利用。因为单一的输入可能并不符合接收方的需求和接收能力，“资源”落地的精准度和使用效率也不高。更为持续性的“资源”输入方式，应该是外部主体联系内部主体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以思想和技术赋能的方式改变“资源”利用情境。

2. 嵌入资源对接的合作网络。

由于开发能力的限制，外部主体时常会忽略内部“资源”的价值。这就导致外部主体很有可能会完全控制内部主体的发展系统，最终使村庄跌入外生发展模式的困境。提高资源引入的效用，在于嵌入“资源”对接的合作网络。

一是外部主体挖掘内部“资源”的高价值特性。乡村实现内外资源的共同利用，其前提是内部资源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从外部主体的发展视角来看，内部资源很多时候都是无用。实际上，没有无用的资源，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在红河县的很多农民看来，恶劣的自然环境限制了当地的发展。但在帮扶主体看来，多民族文化聚居区的资源开发重点应该在民族特色文化。红河县虾昆村至今仍保留着不少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传统习俗和美食，是一个值得开发的地方。该村利用民族特色文化，开发了“房入会、田入股、文化入景、农特产品入市”的发展方式⁵。虾昆村每年都能吸引一大批游客来此参观和消费。同时，红河县的农业种植条件也很差，农产品的产量都比较低。但该县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全县整合为高端果蔬基地、高端稻谷基地、干热河谷基地、优质畜禽供给基地、地方优质传统产业基地，培育出了好几种知名的高端农产品。可见，在常规性发展“知识”的引导下，内部主体经常会忽略“资源”的真正价值。也就是说，不同主体对“资源”的价值特性持有的不同看法，影响了“资源”发挥潜在价值的程度。此时，外部主体可以向内部主体提供挖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因地制宜利用内部“资源”。

二是内外主体建立双向、多维的“资源”传输网络。“资源”不仅仅是外部单向、线性地向内部输入，而是其与内部双向互动的结果。要是单纯地依靠外部输入，内部主体很容易形成对外部排他性的依赖。因此，在挖掘内部“资源”的高价值后，应该建立顺畅的传输网络，以此实现内外主体的互利互惠。新内生发展项目组联动寻甸县和红河县政府，动员了当地的社会组织、精英农民等，一同建立起多层级部门之间的资源共同体。项目组了解到寻甸县的野山茶、野山菌、苗绣产业都未得到充分开发，在资源共同体的协助下，项目组动员校友企业设计和推动了相关经济产业的运营。有学者指出：在不干预内部主体自主决策的情况下，外部主体可以利用多样化的生产和服务经济，实现内外资源的互相依存。^[17]项目组的做法，可以看作是外部主体以产业发展的形式聚合起内部“资源”，以合作网络的形式促成内外的双向流动。这样一来，内部主体具备足以调动外部资源和应对外部力量的能力。在“资源”输入的过程中，有效避免了外部主体给内部主体的系统造成无法弥补和修复的打击。

四、结论与讨论

以各种类型呈现的文化网络通常被看作乡村发展的框架、起点和工具，成为其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机制。然而，内外主体所处差异性文化网络，给乡村振兴的内生实践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本文在“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复合文化网络”的分析框架，从知识、关系、资源三个维度分析多民族文化集居区的经验案例，阐明了外部主体如何顺利地进入内部主体系统并实现发展的全过程。

乡村振兴的内生实践中，内外主体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虽然能够在复合文化网络中得以缓解，但这一分析框架依然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未能看到复杂、多样的文化网络如何随着环境因素而变动。这一框架的具体内涵和形式会因不同民族社会文化、关系、资源等要素的变动，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这就考验着它在不同社区的适用性。比如，它在单一民族聚居区，或者其他多民族聚居区是否具备代表性和统一性。这值得我们在理论与经验层面的进一步商榷。在后续的研究中，有必要对我国其他地区乡村振兴的主体内生实践路径做出对比。

二是内外主体权力关系的不平衡现象仍然难以完全得到消解。“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中，普通农民与精英农民、农村与国家的权力之争不容忽略。复合文化网络分析内外主体互动的逻辑时，也关注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这在复合文化网络框架的三个维度都有着清晰的体现。其一，“知识”的使用通常包含着不同主体对权力的分配和发展模式的塑造。福柯曾论证：知识勾连权力的具体机制是：知识产生权力，是权力意志的体现；知识的分配同时也意味着权力的分配。^[18]外部主体凭借着发展知识、资源等条件而占据着优势性地位，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和规则进一步合法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内部主体的话语权，给内部主体带来压力。助长人们对本土知识的排斥。^[19]其二，内部主体如果过度依赖外部主体在关系和资源层面的帮扶，其内生性发展动力很难得到本质上的提升。虽然内部主体尝试着以本土力量来对抗外部主体的强势地位，但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弥合权力的差距，往往难以在具体实践中得到确认。

乡村振兴实践从外生到内生，再到新内生发展模式的转变，强调的是内外主体在文化网络中的互动关系如何进行。首先，内外主体所面对的复杂的乡土文化，往往意味着背后有着许多难以处理的“关系”。文化的复杂性不单指文化多样性，还指内外主体互动包含的多对关系。不同层次、类型的主体之间都可能面临权力平衡问题。比如，拥有正式权威的基层党组织与非正式权威的精英农民，个体农民与组织，组织与乡村等主体之间的关系，都会同时混合于内生实践的情境中。在这一过程中，内外主体互动关系涉及的问题可能有三种：关系互动无法持续、公私关系错位、部分主体利用关系逐利。主体可能会因资源输入的断裂而中断关系来往；在关系互动中混淆公私关系的界限，导致腐败、徇私；以及诱发主体利用关系追求私人经济收益等等问题的出现。这些都会对乡村振兴的内生实践产生消极影响，甚至直接阻断实践的进程。这需要实践主体在厘清各种关系的本质，分析关系处理的轻重缓急后，再在同一时间段、以多线的方式处理。其次，内外主体互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农民的经济和生活条件，以及重塑深层次的社会发展机制。相对于外部主体的帮扶，更重要的是内部主体再生出适合本土地区发展的社会文化。要实现乡土社会整体性、根本性的变革，需要外部主体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探索内部主体的情况。然而，无论是从结构层面还是行动层面来说，都很难彻底解决外部主体介入的持续性问题。从结构层面来说，主体的行动很难突破结构性的制约，乡村短时间内无法逆转的人口外流，项目制治理模式的弊端，城乡文化融合的困难等因素，导致内外主体的互动呈现出浅层性

的特点。尤其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短、平、快”项目实施的效果远远要比漫长而持久的意识变革行动更受到实践主体的青睐。这必然会加剧内外主体实践中形式与实质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行动层面来说，外部主体几乎不可能长期驻扎于乡村，改变内部主体底层认知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同时，外部主体经常会无意识地轻视内部系统和人员的价值，这就导致他们虽然能够解决内部主体表现的外在需求，但难以挖掘未表现的内在需求。上述提及的种种问题，往往意味着不同主体并不能为乡村发展做出平等的贡献。要想让乡村振兴的实践实现内外主体包容性参与，取得持续性和长足性的进步，还需要不断加以探索和调适。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31.
- [2] 吴越菲. 内生还是外生: 农村社会的“发展二元论”及其破解[J]. 求索, 2022(4):161-168.
- [3] CHATZICHRISTOS GEORGIOS, NAGOPOULOS NIKOLAOS, POULIMAS MICHALIS.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 path toward reviving rural Europe[J]. Rural Sociology, 2021(4):1-27.
- [4] RAY, C.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U. In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M]. Cloke, P, Marsden, T, Mooney, P. H, Eds. Sage: London, UK. 2006:278-290.
- [5] HILARY TOVEY. Introduction: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Era. Sociologia Ruralis[J]. 2008(3):185-199.
- [6] T. N. JENKINS. Putting postmodernity into practic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in the rural development of marginal region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0(3):301-313.
- [7] (美)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4-5.
- [8] 徐宗阳. 机手与麦客——一个公司型农场机械化的社会学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21(2):92-114+227-228.
- [9] (美)埃斯科瓦尔. 遭遇发展: 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M]. 汪淳玉, 吴惠芳, 潘璐,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9-10.
- [10] (加拿大)尼科·斯特尔. 知识社会[M]. 殷晓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14-17.
- [11] (英)普雷斯顿. 发展理论导论[M]. 李小云, 齐顾波, 徐秀丽,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336.
- [12] SHUCKSMITH, M. Dis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place-shaping in diffused power contexts[J]. Sociologia Ruralis, 2010(1):1-14.
- [13]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70.
- [14] 杜鹏. 家庭本位: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底层逻辑[J]. 社会科学研究, 2022(6):83-92.

[15] (英)凯蒂·加德纳, (英)大卫·刘易斯. 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M]. 张有春,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110.

[16] (英)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大纲[M]. 李康, 李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79-80.

[17] MARTIN PETRICK. Reversing the rural race to the bottom: 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J].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3(4):707-735.

[18] (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马月,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48-53.

[19] BRIAN DILL. The paradoxes of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ion in dares salaam[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09(4):717-743.

注释

1 对于乡村发展的主体问题, 内生和外生发展模式中有比较成熟的讨论。外生发展模式指的是: 乡村无法获得特定的发展资源, 只能通过外部的关系和资源来补充。但外部主体的强势性伴随的是内部主体非参与性发展, 削弱和农民发挥自主性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这一模式并不能很好地回应农民真实的发展需求, 造成乡村发展利益的流出, 加剧乡村在发展中的边缘地位。内生发展模式注重的是发掘并培育内部主体的能力。但它忽视了外部主体的资源和行为对发展的重要性。即使在能力建设之后, 仅凭内部主体的能力很难突破现有的发展困境, 无法支撑起乡村的发展。

2 2020年初以来, 笔者带领华东师范大学团队到云南省寻甸县泽铁村开展“社区为本的乡村新内生发展实践探索”乡村振兴创新试验培育项目。该村是苗族、彝族、回族和汉族集居区, 三年来项目组在泽铁村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与服务活动。2022年底, 项目组将创新试验培育项目进一步拓展到红河县, 希望在多民族文化集居区继续探索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模式。

3 “权力的文化网络”既包括正式的等级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也包括非正式的相互关联网(networks of informal relations)。文化指的是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symbols and norms), 通过在网络中的交织赋予网络以一定的权威, 使领导权具备合法性。该研究结果说明了文化社会网络超出资源、社会等资本的重要性, 突出乡土文化在国家—社会的权力结构所起的作用。权力正当性、权力的关系主义和主体的能动性都是该框架具有解释力度的关键。

4 “影像发声法”是一种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它通过组织参与者拍摄照片并进行讨论的方式来激发个人和社区的改变, 其具有要素可视化、问题场景化、参与程度高、行动导向强等特征。该方法在心理学、社会工作、教育学、护理学、环境科学和生态学中被广泛应用。

5 以“房入会”鼓励住房条件较好的农户, 利用空闲房屋、建筑物等可利用空间, 开发客栈、农家乐、由合作社为群众搭建平台, 由合作社统一定价、统一管理。以“田入股”: 参与特色养殖分红, 在保持土地使用性质的基础上, 组织农户以土地入股专业合作社, 不断扩大旅游特色农产品生产规模。以“文化入景”: 吸引游客拉动消费, 在虾昆村举办哈尼长街古宴、欢歌新米节、开秧门活动、书吧、咖啡屋等经营项目以及“村长有请”等旅游活动, 生动展现哈尼族原生态歌舞和传统节日庆典活动。以“农特产品入市”: 依托虾昆村梯田资源优势, 成立稻田养鱼、养鸭合作社, 科学发展“稻-鸭-渔”生态种植养, 打造梯田红米、葛根、梯田鱼、红心鸭蛋、梯田鸭、山地鸡等农特产品品牌。